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九十二期
2019年11月　　頁85~116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DOI: 10.6258/bcla.201911_(92).03

「新」、「異」之變：近代楚辭學現代性轉型的學術特徵

李　文*

摘　要

內外交困的近代環境，西學東漸的學術思潮，將楚辭學推向了學術轉型的關口。一方面，貫通中西的楚辭學者如王國維、魯迅等從西方理論中汲取能量，借鏡西方文藝理論審視楚辭，將楚辭批評從詩教的桎梏中解脫出來，使其面貌一新。另一方面，傳統楚辭學者如王闓運、馬其昶等受到社會環境與學術思潮的雙重影響，箋註楚辭時致力於發揚其微言大義，遂在對屈原形象的解讀上、對楚辭中「怨君」、「求賢」等問題的處理上生發出異於前代的奇詭之論。近代楚辭學亦因此呈現出新與異的雙重色彩。

關鍵詞：近代楚辭學　學術轉型　《楚辭釋》　《屈賦微》

2018.06.01 收稿，2019.07.04 通過刊登。

* 蘇州大學文學院博士生。Email: venvn0403@163.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近代之世，[1]清政府顢頇腐敗，列強虎視眈眈。在如此內外交困、萬方多難的時代環境下，學術思潮卻異常活躍：乾嘉時期如日中天的樸學逐漸衰落，今文經學代之而起，並與之割席分尊。此外，列强的入侵，為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提供契機的同時，又使得近代士人起衰救弊的政治熱情空前高漲，經世思潮得以風行於世。在如此千年未有之變局下，近代楚辭學受社會環境與多種學術思潮角力的影響，呈現出向現代化轉型的趨勢。一方面，經世思潮的風靡和今文經學的復歸，使得學者逐漸摒棄乾嘉時期流行的訓詁考據方法，轉而借騷抒懷，寄寓自身對時風世運的看法，於是在楚辭主旨與屈原形象等問題的闡發上，均提出了迥於前代的奇解異詮。另一方面，西方理論的湧入，為楚辭學的革故鼎新提供了理論基礎。近代楚辭學者借鏡西方文藝理論審視楚辭，在方法上、理論上均脫離傳統楚辭學研究的窠臼，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這種新變與異變的雙重色彩是傳統楚辭學面對新的理論衝擊而走向轉型的必然結果，是近代楚辭學由傳統向現代過渡時所呈現的突出特徵。

二、復歸與轉型：新釋楚辭大義

近代楚辭學現代轉型之萌蘖，首先體現在楚辭箋註領域：一方面，在經世思潮和今文經學復興的影響下，愈來愈多的學者開始摒棄以樸學註經的方法箋

1 關於文學史對「近代」時間上限與下限的界定問題，學界眾說紛紜。二十世紀初的學者對「近代」時間分期呈現出一種混亂狀態，如陳子展將近代的時間分期定為 1898 至 1928 三十年；見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 17。錢基博將「現代」（即通常所說的「近代」）的時間上限界定為 1911 年，下限則在 1930 年；見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7。鄭振鐸將「近代」的時間上限斷自明嘉靖元年等。見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頁 828。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近代史學科的構建將「近代」的分期界定為鴉片戰爭（1840）至五四運動（1919），由於此前文學史對「近代」時間分期的混亂，遂其後文學史上的「近代」亦多沿用此說。如：袁行霈所編《中國文學史》其中「近代文學」一編即是以 1840 與 1919 為近代文學的時間上下限。見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 4 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頁 457。任訪秋，《中國近代文學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黃霖，《近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等著亦選擇以 1840-1919 這一時段界定近代。本文對「近代」時間上下限的劃分亦采用此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授權

註楚辭，轉而致力於闡發楚辭的微言大義，以渴望註騷經世，遂湧現出一大批以闡發楚辭義理為旨歸的楚辭著述。楚辭學由乾嘉時期的訓詁考據為主，轉而走向闡發義理。另一方面，在楚辭要旨的闡釋上，學者不囿陳說，提出了異乎前代的新說。如將楚辭主旨概括為「興楚反王」、「存君興國」，認為〈九歌〉為「祀神以卻秦」之章，將〈離騷〉視為屈原死諫之篇等，無不新人耳目。

（一）由訓詁考據轉向鉤索楚辭義理

乾嘉以來，樸學的興盛使得學術研究多以樸學的方法為準的，乾嘉大儒戴震在〈毛詩補傳序〉中曾言：「今就全詩考其名物字義於各章之下，不以作詩之意衍其說。蓋名物字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詳覈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證也。作詩之意，前人或失之者，非論其世、知其人，固難以臆見定也。」[2]注重考證詩歌名物字義而非詮釋詩歌義理。乾嘉諸人即是以此為準的，在學術研究上追求名物字義而非義理。乾嘉樸學的大盛使得楚辭研究亦走向重考據、輕義理的路子，縱觀乾嘉時期的楚辭學著述，以考證為主要方法的楚辭研究著作，在數量上和影響力上，均獨領風騷。在清代楚辭研究著作中，無論是被李中華等人譽為「有里程碑意義的造詣精湛」的《山帶閣注楚辭》，[3]還是被姜亮夫贊為「洪、朱而後，謹嚴篤實博雅精約無過此書者」的《屈原賦注》，[4]均以考證見長。

迨至近代，樸學研究方法依然影響着楚辭研究，以考證名物、校讎文字、審訂音韻的著述，數量可觀，且涉及楚辭的音韻、名物、文字等方方面面。但是由於嘉道之後，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樸學的研究方法已不再適應時代需要。桐城派方東樹即言：「漢學諸人，言言有據，字字有考。只向紙上與古人爭訓詁形聲，傳注駁雜，援據群籍，證佐數百千條。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國，了無益處。」[5]指出樸學不切實用之弊。鴉片戰爭之後，隨著社會環境的急劇惡化，樸學為學不通世務之病愈發顯露，加之近代特殊的歷史環境，在楚辭學者的話語體系下，屈原所處之世與其所處的內憂外患之環境相似，故在註騷解騷的時候更傾向於借騷抒懷，而非瑣屑、支離地禁錮於名物訓詁。顯然，樸學研究方法已經不適應學者渴望借騷寓感的精神訴求。所以，此期楚辭研究亦出現了從考證名物、釐定字音、辨析字義轉向闡發楚辭微義的趨勢。加之近代萬方

2 清・戴震，〈毛詩補傳序〉，《戴震全書》第 1 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頁 125-126。

3 李中華、朱炳祥，《楚辭學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6），頁 224。

4 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北京：中華書局，1961），頁 202。

5 清・方東樹，《漢學商兑》（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 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多難的社會環境，許多學者借註騷抒發國仇家恨，亦有許多學者企圖從楚辭中探尋救國之道，湧現了一大批以闡發楚辭微義為指歸的楚辭著述，在數量上和影響力均可以與以訓詁考據為主的楚辭著述分庭抗禮（見下表）。

表一：近代以闡發微義為主要內容的楚辭著述

著述名稱	作者	主要特色
《離騷分段約說》	黃恩彤	將〈離騷〉分成十七段，以求〈離騷〉微義。
《離騷啓蒙》	端木埰	求〈離騷〉篇章旨意。
《屈大夫文》	夏獻雲	以屈原二十五篇為正，於文內列朱熹《楚辭集注》註文。
《離騷注》	王樹枏	僅註〈離騷〉一篇，考證名物的同時多闡發〈離騷〉意旨。
《屈賦微》	馬其昶	博采眾說，闡發屈子存君興國之義
《楚辭釋》	王闓運	以公羊學精神闡發楚辭微言大義，附會屈子興楚返王的奇謀大略。
《屈騷求志》	顏錫名	以屈子之文證屈子之志，借屈子抒發一己不容於時的憤慨。
《離騷九歌釋》	畢大琛	對〈離騷〉、〈九歌〉進行分節，視二者為仿變風變雅而作。
《讀騷論世》	曹耀湘	以知人論世之法對〈屈原列傳〉和諸家敘、贊中的問題進行辯證。
《楚詞講義》	廖平	認為楚辭為天學，作者並非屈原，而是秦博士。
《楚辭新解》	廖平	視楚辭為《詩經》之傳，為孔子天學。

表二：以訓詁考據為主要內容的楚辭著述

著述名稱	作者	主要特色
《楚辭初學讀本審音》	強望泰	直錄楚辭本文，不采註文；註音方面，直註本音。
《屈子生卒年考》	陳瑒	考證屈子生卒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離騷釋韻》	蔣曰豫	以屈原以前諸經韻文，證楚辭音讀。
《離騷賦補注》	朱駿聲	訓詁字義、考證古音。
《札迻・楚辭王逸注》	孫詒讓	多訓詁楚辭字義，偶考楚辭史實、名物
《讀楚辭》	俞樾	考辯楚辭名物、制度、史實，訓詁字義。
《楚辭叶韻考》	徐天璋	考證楚辭韻字，以楚辭叶韻，考證四聲的流變。
《楚辭考異》	劉師培	臚列異文，訂正訛誤。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數量上以闡發義理為鵠的的楚辭著述和以訓詁考據為鵠的的楚辭著述大體相同，但是在成就和影響力上，王闓運《楚辭釋》、馬其昶《屈賦微》、廖平《楚詞講義》、《楚辭新解》等作的影響力則較為深遠。姜亮夫曾評《楚辭釋》云：「清人《楚辭》之作，以戴東原之平允，王闓運之奇邃，獨步當時，突過前人，為不可多得云。」[6]評《屈賦微》「由博而反之于約，可為清代說屈賦者之殿」。[7]廖平《楚辭新解》、《楚詞講義》二著雖多奇詭譎怪之論，但是其屈原否定論所引起的論爭對二十世紀的楚辭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窺見，近代楚辭學較之清中期楚辭學已明顯出現重闡發義理而輕考據的傾向。從近代楚辭學者的註騷目的與方法中也可見一斑：

> 是故屈子書，人之讀之者無不欷歔感泣，然真知其文者蓋寡。自王逸已見，謂文義不次。今頗發其指趣，務使節次瞭如秩如，分上下二卷，名曰：《屈賦微》。人之讀之者其益可興起，而決然祛其疑惑乎。又非徒區區文字得失間也。[8]
>
> 屈子著騷歌，陳王道、戒淫昏，誅讒佞之魂，表宗臣之義。其文約，其辭微，騷體然也。……讀屈子之文，即參考屈子之文，以證屈子之志，有不情冤日明，如列宿之錯置者乎？[9]

6 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頁 247。

7 同上註，頁 252。

8 清・馬其昶，〈序〉，《屈賦微》，《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0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景印光緒三十二年集虛草堂刻本），頁 660。

9 清・顏錫名，《屈騷求志・自敘》，黃靈庚主編，《楚辭文獻叢刊》第 65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景印清光緒年間稿本），頁 375-3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讀騷之法，必詳考屈子一生用舍事跡，合以楚國興衰本末。按時事以求之，然後先賢貫天地、揭日月之精忠，千載而下如將見之，所謂誦詩讀書知人論世也。[10]

可以看出，這些楚辭註本在註騷的方法上摒棄了傳統考證為主的方法，馬其昶《屈賦微》強調發揮楚辭旨趣，不囿於文字得失之間，顏錫名《屈騷求志》致力於以屈子之文證屈子之志，曹耀湘《讀騷論世》則以知人論世之法解讀楚辭，均是對乾嘉楚辭研究注重於考證字音、字義、名物的一種反叛。

雖然近代楚辭學在註騷方法上走向了以闡發義理為鵠的的路子，看似是對傳統楚辭學尤其是宋代楚辭學注重義理一派的回歸，但是，其中卻蘊含着對傳統的反撥與變異。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對楚辭篇章大義的闡發中，近代楚辭學者主觀地放大了屈原的政治理想，在他們的闡釋下，屈原楚辭二十五篇字裏行間均寄寓了屈原的政治理想與政治謀略。如王闓運「興楚反王」說、馬其昶「存君興國」說、王樹枏「〈離騷〉為屈原尸諫」說等，實在是異乎前代，獨具特色。

（二）屈騷篇章大義的新解

近代楚辭著述在著重闡發楚辭義理的同時，主觀放大了屈原「興楚反王」、「存君興國」、「强軍卻秦」等政治理想。在近代楚辭學者的闡釋下，楚辭字裏行間所流露的多是屈原振興楚國、謀返懷王的政治訴求。王闓運《楚辭釋》中的「興楚反王」說，馬其昶《屈賦微》中的「存君興國」說即為代表。《楚辭釋》在界定楚辭創作時間之時，直將屈原賦二十五篇的創作定為懷王客秦之後，其在〈離騷〉題解中云：

> 時原年四十有六，名高德盛。新王初立，勢不能不與原圖事。……凡楚詞二十五篇皆作於懷王客秦之後，初無怨己不用之事。[11]

王闓運認為屈原創作楚辭均在懷王客秦之後，因此其中含藏了屈原謀求懷王返國的理想。如其註〈離騷〉「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云：「草木，

10 清・曹耀湘，《讀騷論世》（南京：南京圖書館藏，民國四年湖南官書報局鉛印本），卷 1，頁 2。

11 清・王闓運，《楚辭釋》，《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0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景印清光緒二十七年刻本），卷 1，頁 619-6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喻群臣也，草喻新進者，木喻在位者。零落，無賢材也。國無賢材，恐王久客而不反。」[12]強調屈原所憂慮之事在於楚國無賢才以謀劃懷王返國之事。再如：〈悲回風〉「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云：「著讀為著衣之著，志之所著，言己志在興楚反王也。」[13]直言屈原之志在於「興楚反王」。馬其昶《屈賦微》中的「存君興國」說與王氏異曲同工，如其註〈天問〉「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一句，認為屈原所說乃是楚國子西假稱王以安撫國民之事，進而推斷屈原「以此終篇，其存君興國之念何其篤也」。[14]再如註〈哀郢〉「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云：「此及〈抽思〉篇之靈魂皆謂懷王也。言懷王思歸，己亦何嘗須臾忘反君乎？」註「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云：「竄逐之臣雖欲悟君以反懷王，不可得也。」[15]可見，在馬其昶的闡釋下，屈原心之所繫在於使懷王返國。顯然，王闓運、馬其昶二人主觀放大了屈原「興楚反王」的政治理想，將楚辭中多數詩句看作是屈原對謀返懷王而不得的隱喻。據統計，王闓運《楚辭釋》中關於屈原與頃襄王謀劃使懷王返國、願懷王返國、憂慮懷王不能返國的解釋，在註〈離騷〉中有十處、註〈九歌〉中十二處、註〈天問〉中三處、註〈九章〉中十一處。在《屈賦微》中則集中在〈九章〉諸篇與〈招魂〉一篇，亦有八處之多。

在對楚辭具體篇章大義的解讀上，近代學者亦提出了許多令人回皇眩惑的奇論。如王樹枏《離騷注》在闡釋〈離騷〉主旨時，認為〈離騷〉是屈原死諫之章。其云：

> 以上言己以忠賢不容於世，遭尤含詬，不如以死明之。前曰「九死」、曰「溘死」，此又曰「死直」，屈原至此蓋死志決矣。吾故嘗謂：屈原之〈離騷〉以尸諫者也。[16]
>
> 屈原懷石投汨羅以死，在頃襄王七年。此時已預定死志，蓋將以尸諫也。〈懷沙〉篇云：「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即此亂之意。王逸所

12 清・王闓運，《楚辭釋》，《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02 冊，卷 1，頁 620。

13 同上註，卷 4，頁 642。

14 清・馬其昶，《屈賦微》，《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02 冊，卷上，頁 679。

15 同上註，卷下，頁 682。

16 清・王樹枏，《離騷注》，黃靈庚主編，《楚辭文獻叢刊》第 67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景印清光緒末至民國初新城王氏刻《陶廬叢刻》本），頁 80。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謂「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也。[17]

王氏認為〈離騷〉中多次提及「九死」、「溘死」、「死直」，並直言效仿彭咸，是因為屈原作〈離騷〉之時已經決意以死諫君，〈離騷〉即是其死諫之詞。王氏此說實際建立在〈離騷〉創作時間為頃襄王之世這一基礎上，其認為〈離騷〉作於懷王客秦之後，而非王逸等人所云的懷王之世。無論是其認為〈離騷〉是屈原死諫之詞還是將其創作時間定為懷王客秦之後，均是異於傳統楚辭學對〈離騷〉的闡釋。不僅如此，顏錫名《屈騷求志》亦對楚辭具體篇目的要旨提出了新釋，如其否定〈九歌〉為祀神之辭，而完全是屈原「悲歌當哭之作」。其在〈九歌〉題解云：

> 〈九歌〉九篇，皆屈子悲歌當哭之作。其文愈約，其辭愈微。然其命意，固可參以他篇得之。絕非祀神之辭，亦非感懷漫興之什所可比例。[18]
>
> 〈九歌〉九篇，前七篇皆詠未放江南時事，〈河伯〉則涉江時事，惟〈山鬼〉一篇，為在江南時事。[19]
>
> 〈國殤〉、〈禮魂〉二篇，無論作於何時何地，要是實賦其事，並不牽着自己，故無哀怨酸苦之音。較之〈九歌〉，迥不相類。[20]

顏錫名不僅否認〈九歌〉與祀神有關，而僅是屈原借題抒情之文，更是認為〈九歌〉非一時一地所作，且〈國殤〉、〈禮魂〉是實賦其事，遂在編排上立於其餘九篇之後，並加以「〈國殤〉、〈禮魂〉總論」論述其要旨。關於〈九歌〉的篇章要旨，自東漢王逸以來，既有屈原改定民間祭祀歌辭並以之托以諷諫之說。歷代學者鮮有對此提出質疑，爭論多聚焦於〈九歌〉的寫作時間。而顏氏斷然否定〈九歌〉與祀神有關，僅是借景抒懷之作，實為對傳統〈九歌〉闡釋的一種反叛。關於〈九歌〉的創作亦有馬其昶「祀神以卻秦」之說，亦新人耳目。其云：

17 同上註，頁 122。

18 清・顏錫名，《屈騷求志》，黃靈庚主編，《楚辭文獻叢刊》第 66 冊，頁 1。

19 同上註，頁 4。

20 同上註，頁 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何焯曰：「《漢志》載谷永之言云：『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邀福助卻秦軍。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則屈子蓋因事以納忠，故寓諷諫之詞，異乎尋常史巫所陳也。」其昶案：懷王既隆祭祀、事鬼神，則〈九歌〉之作必原承懷王命而作也。……吾意懷王事神欲以助卻秦軍在此時矣。[21]

馬其昶雖引何焯之說，但是何焯卻未明言屈原〈九歌〉為祀神以助卻秦之詞，馬氏則根據谷永之言與何焯的闡釋，認定〈九歌〉的寫作是懷王授意，目的是祈求神助，此說實為新奇。

如此種種，可以看出，近代楚辭學不僅出現了大量以闡發楚辭義理為指歸的著述，而且在闡發屈原楚辭二十五篇的主旨時，亦是敢於突破傳統，生發出眾多奇詭的新論。顯然，這種註騷方法的轉變與對楚辭要旨的闡釋，體現了近代楚辭學在向現代楚辭學轉型的過程中求新求變的同時，由於缺乏科學的方法論指導，一味地在對楚辭大義的闡發上追求異於前人，遂對楚辭要旨的闡發走向了過度闡釋的歧途。雖其最終所呈現的面貌新於前代，但是這種「新」更多的是「異變」而非開拓與創新。

三、解構與變形：重塑屈原形象

在近代戰火頻仍、內憂外患的社會環境下，學者在闡釋楚辭時受到經世致用精神的感召，渴望註騷淑世，他們在註騷解騷時寄寓了自身救亡圖存的精神訴求，因而闡釋屈原形象時，剝離了傳統話語體系下「忠貞」、「愛國」的形象，甚至消弭了屈原主體精神中「忠貞」與「怨懟」的矛盾，而主觀地將屈原視作楚國治亂興衰的關鍵人物，進而強化屈原謀士、能臣與權臣的形象，使得屈原形象發生了變異。

（一）謀士形象的深化

近代楚辭學者在闡釋屈原形象時，刻意放大了屈原的謀臣特質，出現了將屈原視為謀士的傾向，他們認為屈原存君興國的謀略隱含在楚辭的字裏行間，所以在箋註楚辭時時常附會史實，根據〈屈原列傳〉中屈原使齊、勸殺張儀等事，演繹出屈原主張結齊卻秦的謀略，將屈原塑造成善於謀略的政治家。從《楚辭釋》、《屈賦微》等作中即可以窺見。

21 清・馬其昶，《屈賦微》，《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02 冊，卷上，頁 666-6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王闓運《楚辭釋》歷來被視為多奇詭譎怪之論，在王闓運的闡釋下，屈原楚辭之作，充滿了對治國理政的隱喻。縱觀《楚辭釋》中關於屈原政治理想、政治手段的闡釋，可以看出在王闓運筆下，屈原近乎縱橫家。關於屈原的政治理想，王闓運概括為「興楚反王」，並在楚辭中附會屈原為了興楚國、返懷王的奇謀大略。主要集中在兩點：其一，王闓運認為楚辭中有屈原結齊抗秦的隱喻。如註〈離騷〉「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兩句云：「前王，周文王也。武，跡也。奔走先後，文王所恃以合與國滅昆夷。原欲合從擯秦，以及其踵跡。」[22]王闓運認為「及前王之踵武」一句乃是隱喻屈原有合縱擯秦之謀。再如註「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其云：「咸池、扶桑，皆在東方，以喻齊也。飲馬、總轡，言欲結齊為援。」[23]進一步說明屈原企圖聯合的對象主要是齊國。在註〈少司命〉時則進一步說明屈原的結齊抗秦之謀，如註「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兩句，云：「晞髮，自新以結交於齊，結齊以攻秦也。」[24]關於屈原結齊擯秦的謀略在《楚辭釋》中比比皆是，可見在王闓運筆下，屈原雖遭流放，猶借作詩以隱喻自己對楚國國勢的關注。

其二，則是王闓運認為屈原有入秦救王之謀。關於此點，他在《楚辭釋》中亦多有提及。如：

> 白水，自南陽至洵陽，今謂之白河。濟之，從漢中入秦。[25]（註〈離騷〉「朝吾將濟於白水兮」）
>
> 登閬風，喻入秦從王也。縶馬，喻不進。已入秦愈無外援也。[26]（註〈離騷〉「登閬風而縶馬」）
>
> 言懷王西客，不知所居，無門從入，以通其氣也。[27]（註〈天問〉「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可見屈原入秦之心。不僅如此，王闓運認為屈原在主張合縱擯秦的同時，亦規劃出一套入秦的謀略。如註〈離騷〉終篇云：「秦之弱楚，在據巴蜀取夔巫以壓夷陵，今更欲從黔滇、通緬藏、包雍涼，窺蜀通巴，以復夔巫。此屈原平生

22 清・王闓運，《楚辭釋》，《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02 冊，卷 1，頁 620。
23 同上註，頁 622。
24 同上註，卷 2，頁 627。
25 同上註，卷 1，頁 623。
26 同上註。
27 同上註，卷 3，頁 6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壯謀，有志而未得試者。」[28]王闓運根據〈離騷〉中「乎吾行此流沙兮」至「載雲旗之委蛇」十二句，即演繹出屈原一套攻秦的方案，實令人錯愕，但是卻能清楚地看出，在王闓運筆下屈原形象較之前代有很大的不同，屈原已活脫脫變成一名謀士。

與王闓運《楚辭釋》一樣，馬其昶《屈賦微》中亦認為屈原楚辭二十五篇實蘊含着屈原強軍興楚的治國方略。

一方面，馬其昶認為楚辭隱含了屈原強軍卻秦的理念。這一點在馬其昶釋〈九歌〉時表現得尤為明顯，其認為〈九歌〉之作實是懷王授意屈原所作，目的是祀神以助卻秦。並進一步推演〈九歌〉的創作，云：「懷王十一年為從長，攻秦。十六年絕齊和秦，旋以怒張儀故，復攻秦，大敗於丹陽，又敗於藍田。吾意懷王事神欲以助卻秦軍在此時矣。」[29]將〈九歌〉的創作和秦楚之間的史實相聯係，認為是懷王為了祈求神助而大興祭祀，並命屈原作此祭神之辭。如其註〈湘君〉「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閑」兩句時，馬其昶認為是屈原將懷王受張儀之惑絕齊款秦和其後的秦楚之戰的來龍去脈一一告知神靈，其云：「此蓋述其事以求神之聽直也。」[30]再如註〈東君〉「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中云：「谷永謂懷王隆祭祀，欲以助卻秦軍。此章正其祝神卻秦之詞。」[31]除了〈九歌〉，馬其昶在註楚辭的其他篇章時亦時時發揮屈原結齊抗秦的謀略。如註〈抽思〉「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兩句云：「搖起橫奔謂使齊之役。尤同疣，病也。鎮，安也。民之病秦久矣，故願結齊拒秦以自鎮安，原之計畫如是，所謂成言者此也。」[32]馬其昶認為〈離騷〉中的「初既與余成言兮」的「成言」是指屈原與懷王約結齊抗秦之謀。

另一方面，馬其昶認為屈原楚辭中飽含了仇秦的情緒，所以屈原一再地痛斥頃襄王忘仇和秦。如註〈天問〉「蜂蛾微命，力何固」云：「復仇洩憤，蜂蛾之微猶且有然。懷王客死，頃襄獨不念其父乎？」[33]再如註「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其云：

> 此又言秦之無道由來舊矣。自其先世兄弟且以利相爭奪，而楚乃忘仇

28 同上註，卷 1，頁 625。

29 清・馬其昶，《屈賦微》，《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02 冊，卷上，頁 667。

30 同上註，頁 668。

31 同上註，頁 670。

32 同上註，卷下，頁 683。

33 同上註，卷上，頁 6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忍恥與為婚姻，豈足恃邪？以上言武功不可不厲，國仇不可不思。[34]

認為此處是隱喻頃襄王與秦國聯姻之事，諷諫頃襄王不可忘記父仇，強軍以抗秦。再如註〈招魂〉「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云：「蓋諷諫頃襄動其哀死之心，而激其不共戴天之志。」[35]均是諷諫頃襄不忘復仇。可見，在馬其昶的闡釋下，屈原雖不似王逸運筆下那樣精於謀略，但是在馬其昶的話語下楚辭飽含屈原存君興國的策略。

除王逸運《楚辭釋》和馬其昶《屈賦微》外，近代許多楚辭學者亦表現出將楚辭看作是隱含屈原存君興國方略的傾向，因此在塑造屈原形象時，往往認為屈原善謀多智。正如《屈騷求志》將「及少康之未家兮」至「好蔽美而稱惡」一小節看作是屈原在頃襄王未立之時，結交、拉攏頃襄王，其云：「此節蓋隱頃襄。未家，言未為君也。君在而欲交結世子，求其進言，是理之不足也。」[36]在顏錫名筆下，屈原已近乎投機分子。

（二）能臣形象的強化

關於屈原的政治能力與才華，司馬遷〈屈原列傳〉已有論及：（屈原）「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37]將屈原視為對內可以處理政事，對外可以應對諸侯的能臣。不僅如此，司馬遷還將屈原之死與楚國的最終亡國相聯繫：「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38]馬其昶、王逸運、顏錫名等人繼承了司馬遷的觀點，並放大了屈原的政治才華和其對楚國興衰的影響，所以他們一方面不斷強調屈原楚辭二十五篇飽含了屈原的政治策略，另一方面則進一步認為屈原合縱抗秦、強軍卻秦、滋植賢臣等謀略是楚國復興的關鍵。

在《屈賦微》中，馬其昶將屈原視為楚國的能臣，其政策、憲令關乎楚國的興衰。如：

《史》稱原「明於治亂，嫺於辭令」，觀其論列三代興亡如指諸掌，

34 同上註，頁 679。

35 同上註，卷下，頁 695。

36 清・顏錫名，《屈騷求志》，黃靈庚主編，《楚辭文獻叢刊》第 65 冊，頁 451-452。

37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 2481。

38 同上註，頁 24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誠命世之偉才矣。[39]（註〈天問〉「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歷數古人遇合之無常，見士不遇不足惜。獨己所立之法度，實興亡治亂所關。故雖死而猶欲畢其辭也。[40]（註〈惜往日〉「不畢辭而赴淵兮，惜靡君之不識。」）

對比王逸、洪興祖等人之註，「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一句，王、洪二人均認為是指驪姬讒殺申生之事，馬氏則從屈原對前代興亡的歷史的敘述中看出屈原的政治才華和眼光。〈惜往日〉「不畢辭而赴淵兮，惜靡君之不識」一句，王逸認為是屈原「哀上愚蔽，心不照也」，[41]朱熹則認為是屈原「設若不盡其辭，而閔默以死，則上官、靳尚之徒靡君之罪，誰當記之耶？」[42]二者均在強調屈原為臣忠貞之義，而馬其昶則在強調屈原的用世之才。可見，在馬其昶的闡釋下，屈原為興楚所謀劃的方針，如結齊抗秦、強軍卻秦、滋植賢材等策略，是楚國強軍興國的關鍵所在。

不僅如此，顏錫名《屈騷求志》亦將屈原看作楚國興亡的關鍵，其在〈哀郢〉題解中直言：「蓋以見己之去留，實繫國之存亡。」[43]在〈惜往日〉題解中亦與馬其昶一樣，將屈原所立之法度看作是楚國復興的關鍵，其云：「蓋己往日所作之憲令，原本先世之典章。身雖就死，法度俱存，君苟念而法之，國勢不難復振。」[44]可見，顏錫名亦認為屈原是楚國的能臣，其死生關乎楚國的存亡。再如，其闡釋屈原投水一事，認為屈原早已準備效仿先賢投水，但遲遲未有行動，在於仍希冀自己為君所用。此種觀點在註解〈九章〉諸篇中多次提到，如在〈悲回風〉篇中云：「惟諫君不聽，抱石沈淵，究竟於國何益？於君何益？」[45]在〈惜往日〉篇又云：「其所以遲遲不即死者，誠愛惜此有用之身。意謂不得之於先君，猶將得之於嗣君也。」[46]可以窺見，在顏錫名的詮釋下，屈原在〈九章〉中表現出對投水的猶豫不決，是希望等待時機大展拳腳，屈原的用世之心在《屈騷求志》中得到了放大。

39 清・馬其昶，《屈賦微》，《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02 冊，卷上，頁 678。
40 同上註，卷下，頁 687。
41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153。
42 宋・朱熹，《楚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頁 97。
43 清・顏錫名，《屈騷求志》，黃靈庚主編，《楚辭文獻叢刊》第 66 冊，頁 171。
44 同上註，頁 209。
45 同上註，頁 195。
46 同上註，頁 2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近代學者如馬其昶、顏錫名等人，將屈原視作楚國興亡的關鍵人物，將一國興亡繫於一人之身，蘊含著他們渴望借楚辭尋找救國救世良藥的訴求。從近代楚辭學者將屈原視作多謀善智的謀士，強化屈原的能臣特質，誇大屈原的政治才華和謀略等對屈原形象的全新闡釋中，可以窺見近代學者身處萬方多難、國將不國的時代環境下渴望賢臣救國的心理狀態。

（三）權臣形象的確立

如果說屈原謀士與能臣的形象，前代學者或多或少均有論及，那屈原權臣的形象則是近代學者獨創，尤以王闓運和王樹枏為最。

在《楚辭釋》的開篇，王闓運即云：

> ……時原年四十有六，名高德盛。新王（頃襄王）初立，勢不能不與原圖事。原乃結齊款秦，薦列眾賢，詆毀用事者，眾皆患之。乃譖以為本欲廢王，又以懷王得反，將不利王及令尹。王積前怒，固欲遠之，而無以為名，因是誣其貪縱專恣，放之江南，而反以忘讎和秦為其罪。原因托其所薦達者於令尹，而所薦者趨時易節，附和阿俗，國事大變。原忠憤悲鬱，無所訴語，故行吟湖泉，作為此篇。[47]

可見，在王闓運看來屈原並不是在懷王時因讒言而不得重用，而是頃襄初立之時，屈原作為權臣結齊款秦、薦列眾賢、詆毀用事者，而招致小人的讒言，被流放江南。這裏小人詆毀屈原有廢新王之謀，而被頃襄王流放，從側面亦可以看出屈原有廢黜頃襄王的能力。在王闓運的話語下，頃襄王與屈原的關係類似於新君與權臣之間的關係，其在註〈少司命〉「望美人兮未來」至「荃獨宜兮為民正」一段云：「言必反懷王乃可定國。荃，懷王也。獨宜，駁頃襄不宜。」[48]直言頃襄王沒有為君的能力。再如：註〈山鬼〉「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云：「言故國荒僻，禍難又急，頃襄不可輔也。」[49]更是明言屈原不願輔佐頃襄王。如此等等，在《楚辭釋》中比比皆是。在王闓運的闡釋下，屈原絕非王逸、朱熹筆下忠貞的賢臣，而更似權臣。不僅如此，王闓運認為屈原是存在廢新王的想法的，如：〈悲回風〉「見伯夷之放跡」下註：「伯夷讓

47 清・王闓運，《楚辭釋》，《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02 冊，卷 1，頁 619。
48 同上註，卷 2，頁 627。
49 同上註，頁 6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望頃襄倣其跡也。」[50]暗示頃襄應讓位於賢。其如此塑造屈原形象實為前所未有，但正如陳子展先生所云：「（王闓運）凡所云云，則近鑿矣。彼蓋自傷其一生縱橫計不就，而有托焉者也。」[51]王闓運如此新釋屈原形象，極有可能蘊含着王闓運對晚清政治環境的影射。

王闓運將屈原視作權臣這一觀點，在近代亦有學者回應。王樹枏《離騷注》即是將〈離騷〉的創作時間定為懷王客秦之後，並根據懷王入秦不返這一史實，附會楚國有人想立懷王庶子為君，其釋「周流乎天余乃下」一句云：「此時懷王不返，太子在齊。諸臣議立庶子，紛然盈廷。……屈子以其不足為圖國之君，故有改求之語。此下即改求之君，蓋亦庶子也。」[52]即是指屈原不願輔佐庶子，想要更立賢君一事。此事在《離騷注》中亦多有闡釋。

> 此當指王之庶子，子蘭輩康娛淫遊、美而無禮，蓋不足與有為也。[53]（註「日康娛以淫遊」）
>
> 言王之庶子，不足與共事。故違而棄去，更求賢君立而事之。[54]（註「來違棄而改求」）

這裏屈原所求「賢君」絕非頃襄王，在《離騷注》中頃襄王雖為正統，但仍不是可以輔佐的賢君。其註「哲王又不寤」一句云：「頃襄王又信任子蘭，忘父之仇。」[55]註「余焉能忍與此終古」又云：「嗣君又信讒蔽賢不足與圖國也。」[56]可見，在王樹枏的闡釋下，屈原不僅在朝中有立新君之權，而且在〈離騷〉中質疑頃襄王權威，王樹枏筆下的屈原已與王逸、洪興祖、朱熹等人筆下忠誠惻怛愛君的形象有所不同。在其話語下，強調的是屈原的有所作為而並不僅僅是忠君。

要而論之，近代諸多楚辭學者在闡釋屈原與楚辭時，認為屈原善謀多智，並在楚辭隱含了興國存君的策略，這是在近代特殊歷史環境下，對屈原形象闡釋的一種變異，對傳統屈原「忠君」、「愛國」等形象的剝離，取而代之的是

50 同上註，卷 4，頁 642。
51 陳子展，《楚辭直解》（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頁 217。
52 清・王樹枏，《離騷注》，黃靈庚主編，《楚辭文獻叢刊》第 67 冊，頁 101。
53 同上註。
54 同上註。
55 同上註，頁 104。
56 同上註，頁 1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集謀士、能臣、權臣為一體的嶄新形象。此種闡釋是在經世思潮影響下，以強調楚辭的致用性，側面反映了近代學者渴望在內憂外患、國將不國的社會環境下通過註騷淑世，亦反映出近代楚辭學在由傳統向現代蛻變時，在走向新變的同時亦產生了變異。

四、標新與立異：奇解楚辭詞旨

近代楚辭學的異變不僅僅停留於對屈原形象的重新解讀，在對楚辭具體詞章的闡釋上，亦時常提出異於前人的奇論新見。在近代楚辭學者的話語下，楚辭已不僅僅是屈原抒發情感的載體，更多的是寄托了屈原的政治理想與存君興國的謀略。因此在對楚辭具體詩句的闡釋上，近代楚辭學者尤為強調賢臣明君的重要性。繼而對屈原「求賢」和屈原對兩代君王的情感等問題的處理上，生發出了種種新奇的闡釋。

（一）突出屈原薦賢用能

屈原薦賢用能問題，王逸《楚辭章句》即有闡述，其云：屈原為楚國三閭大夫之時「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57]強調屈原有識人用人之能，並且王逸在註「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一節時，認為屈原上下求索是求與己志同道合的賢臣，云：「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己合志者也。」[58]可見，王逸亦認為屈原顧念楚國缺乏賢臣，有求賢以興國之心。但是，近代楚辭學者刻意放大了屈原的求賢欲望，認為楚辭中處處蘊含著屈原求賢的訴求。如王樹枏《離騷注》，雖只註〈離騷〉一篇，裏面卻多次提及勸諫楚王用賢、強調賢才的作用及屈原薦賢。例如，屈原在〈離騷〉中多次提及「脩」字，王逸將之釋為「遠」，但是王樹枏將之釋之為「賢」，遂將「脩能」一詞釋為「賢能」，「脩名」釋為「賢名」。不僅如此，王樹枏還將屈原滋蘭樹蕙之舉，看作是滋植賢臣，其云：「蓄養眾賢，苟得隨時採進，則己雖萎絕亦無所傷。」[59]對賢臣興國的強調可見一斑。再如曹耀湘《讀騷論世》，雖未明言賢臣對楚國的興亡至關重要，但是卻通過楚臣昭睢來側面表明楚國用賢則興，不用賢則亡的理念。其在〈天問疏證〉中即云：「頃襄不用昭睢，反以子蘭為令尹，此楚國所以危亡之由。」[60]將楚國的危亡繫於昭睢一人之身。其在註「吳

57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2。

58 同上註，頁 27。

59 清・王樹枏，《離騷注》，黃靈庚主編，《楚辭文獻叢刊》第 67 冊，頁 74。

60 清・曹耀湘，《讀騷論世》，卷 2，頁 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光爭國，久餘是勝……爰出子文」將昭睢比之子文，云：「今若能悔悟改過，以圖自強而刷國恥。安見子文不再出於今日也。昭睢用策立君，權宜定難，固可以奏子文、子西之勳者，頃襄乃不用昭睢反以子蘭為令尹，屈原能無慨乎？」[61]痛惜頃襄王不用賢臣昭睢而用子蘭，強調楚國之亡源於頃襄王不用賢臣。

不僅如此，近代一些楚辭學者認為屈原不能薦達賢臣是其憂愁煩悶的重要原因。如馬其昶《屈賦微》註〈思美人〉「令薜荔以為理兮」至「憚蹇裳而濡足」四句云：「言己身之不保，何能薦賢。」再如註其後兩句「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云：「明知賢才有益於國，徒以己之不諧於世，不能薦達，不能不自疑耳。」[62]而王逸、朱熹等人均無此解，如王逸註解後兩句云：「我性姱直，不曲撓也。」，「徘徊進退，觀眾意也。」[63]朱熹註此二句云：「道既不行，居上處下，無適而可，形偃蹇而不服，心耿介而使然也。」[64]二者均是強調屈原姱直耿介而不為世用，徘徊窘迫之情態，而馬其昶則認為是屈原不能薦達賢人之苦。再如註〈悲回風〉「芳已歇而不比」一句云：「天地閉、賢人隱，所憂非止一身之故。」[65]言屈原所憂在於賢人隱退。此句王逸解作：「志意已盡，知慮闕也。」[66]王逸所解則偏向於強調屈原觀此草木零落之態，借景抒懷，馬其昶則是認為「芳歇」暗喻「賢士隱」。諸如此種解釋，在《屈賦微》中，數見不鮮，可以看出，在馬其昶的闡釋下，不能薦賢、國無賢臣亦是屈原憂愁煩悶、絕望自沉的重要因素。

在王闓運筆下，賢臣興國更是被發揮得淋漓盡致。一方面，王闓運重視賢材在「興楚反王」之謀中的作用。其云：「賢材既盛，行止皆有備。」[67]（註「余既茲蘭之九畹兮……集杜衡與芳芷」）此處的行動指伐秦之謀，認為楚國滋植賢才利於伐秦。另一方面，在王闓運看來，薦賢亦成了屈原被放以後，參與國政的媒介。其云：「託所薦於大臣，使相連絡攀附，謀國之苦心也。」[68]（註「擥木根以結芷兮……索胡繩之纚纚」）所以王闓運將屈原謀略終不可用的原因，歸咎於國無賢人與屈原同列。如釋「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云：

61 同上註，頁 20。
62 清・馬其昶，《屈賦微》，《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02 冊，卷下，頁 686。
63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149。
64 宋・朱熹，《楚辭集注》，頁 93-94。
65 清・馬其昶，《屈賦微》，《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02 冊，卷下，頁 689。
66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158。
67 清・王闓運，《楚辭釋》，《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02 冊，卷 1，頁 621。
68 同上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無賢材，恐王久客而不反。」[69]諸如此類的論述在《楚辭釋》中不勝枚舉。

總而論之，近代楚辭學者在註解楚辭，尤其是註解屈原辭賦二十五篇之時，格外強調屈原的薦賢用能之才，認為賢臣可以力挽楚國將傾之勢。此種傾向，蘊含著近代楚辭學者對時風世運的看法。如王闓運即是其中代表，王闓運一生，亦是懷忠謀而不可用，所以對薦賢用人頗有感慨。其子王代功為其所編的年譜之中，即多次提到王闓運與友人李桓、郭嵩燾等人論求賢、用賢之策。如光緒八年與郭嵩燾等人論納賢之法云：「為今之計，唯有使政府開幕府，然後可大致人士，就中選擇而授之官。若先授以官、誘以爵位，必不能致賢矣。」[70]不僅看出王闓運對納賢頗有見解，亦可以看出王闓運有用世之才。再如，淡泊名利、無意仕進的馬其昶，王樹枏在為其撰墓誌銘時亦言其「家國存亡之故，未嘗一日釋諸懷」，[71]其上奏皇帝言新政與民生，亦可以窺見馬其昶有志於改善近代內憂外患的社會環境。可以看出，近代楚辭學者註解楚辭尤其重視賢臣對國家興亡的作用，帶有一定的時代特色，他們企圖借註楚辭抒發自己對時風世態的看法，以註騷經世。

（二）強化屈原怨「君」

在處理屈原怨君的問題上，近代楚辭學者亦作出了異於前代的新解。主要在於近代楚辭學者並不為楚辭中的怨君思想開脫，而是將屈原怨的對象從懷王與頃襄王，置換為僅是頃襄王。在近代楚辭學者界定楚辭創作時間中即可見一斑，其認為屈原所作大多篇章都寫於懷王客秦之後。如王樹枏《離騷注》一卷，即將〈離騷〉的創作時間定為懷王客秦之後，註「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一句云：「是時懷王入秦不反，故言無女。女，以喻君也。」[72]如此界定屈原楚辭寫作時間，實際是將屈賦中所怨之「君」置換為頃襄王。王闓運《楚辭釋》將屈原楚辭二十五篇的創作時間均界定為懷王客秦之後，其在〈離騷〉題解中即開宗明義地說：「凡楚詞二十五篇皆作於懷王客秦之後，初無怨己不用之事。」[73]曹耀湘則認為除了〈九歌〉作於懷王罷黜屈原之時，其餘均作於懷王客秦之後，稱：「其著述之先後，當以〈九歌〉十一篇為被絀時所作，〈騷經〉、〈天問〉、〈遠遊〉、〈卜居〉、〈漁父〉五篇為被放時所作，〈九章〉

69 同上註，頁 620。
70 王代功，《清王湘綺先生闓運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頁 118。
71 卞孝萱、唐文權編，《民國人物碑傳集》（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頁 597。
72 清・王樹枏，《離騷注》，黃靈庚主編，《楚辭文獻叢刊》第 67 冊，頁 99。
73 清・王闓運，《楚辭釋》，《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02 冊，卷 1，頁 6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授權

九篇為南遷沅湘將絕命以前所作。」[74]此外，馬其昶《屈賦微》將〈天問〉、〈九章〉、〈招魂〉諸篇視作懷王客秦之後之作，顏錫名《屈騷求志》認為〈河伯〉、〈山鬼〉、〈天問〉、〈招魂〉以及〈九章〉中〈涉江〉之後六篇均作於懷王客秦之後。可以看出，近代學者在註楚辭的時候或多或少均表現出將屈原楚辭二十五篇的寫作時間多界定為懷王客秦之後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導致最直接的結果是將屈原怨懟的對象變成頃襄王。

進一步說，近代學者在闡釋屈原怨君時，其怨的核心主要是頃襄王無德，忘記父仇。正如王闓運在〈招魂〉題解中云：「此當楚去郢之後，原自沅暫歸，忽悔悟而南行，君臣相絕，流亡無所。宋玉時從東徙，聞原志行，知必自死，力不能留之。因陳頃襄奢惰之狀，託以招原，實勸其死。自潔以遺世，不得已之行。」[75]直將〈招魂〉中楚國歌舞、飲食、建築等的描繪，視作是頃襄王奢靡墮落的生活方式，痛斥頃襄不賢。王闓運以此描述屈原，弱化了屈原「數責懷王」的怨君思想，而將「怨」的矛頭指向頃襄王。不僅如此，王闓運在《楚辭釋》中多次痛斥頃襄不孝，如在註〈惜頌〉「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一句中云：「頃襄代懷，如周平嗣幽，父子之間皆託怨於蒼天也。」[76]將懷王與頃襄王比作周幽王和周平王，暗諷頃襄王不返懷王是殺父之舉。痛斥頃襄王貪位，不返懷王。馬其昶《屈賦微》亦有類似主張，其註〈招魂〉「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云：

> ……以上言懷王羈魂於外之愁苦，以下則盛陳楚宮室服御之崇麗、娛樂。凡所陳皆生人之趣也，死則無此矣。縱招魂歸來已不能復用。此蓋諷諫頃襄，動其哀死之心，而激其不共戴天之志。[77]

馬其昶的觀點與王闓運不謀而合，均認為〈招魂〉中所陳列的楚國宮室、服裝、飲食等的華麗奢靡，是在暗諷頃襄王。一如馬氏在註〈思美人〉「觀南人之變態」所云：「君臣上下竊以得位為樂，並無欲反懷王之志。忘仇忍恥，故曰變態。」[78]再如註〈哀郢〉「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一句云：「哀州

74 清・曹耀湘，《讀騷論世》，卷 1，頁 2。
75 清・王闓運，《楚辭釋》，《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02 冊，卷 9，頁 649。
76 同上註，卷 4，頁 634。
77 清・馬其昶，《屈賦微》，《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02 冊，卷下，頁 695。
78 同上註，頁 6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土平樂，蓋諷其忘仇耳。」[79]註「孰兩東門之可蕪」云：「言其昏而忘亂也。」[80]直言頃襄王於楚國眾臣沉溺與得位的喜悅而忘記父仇，對頃襄王的痛斥可見一斑。不僅《楚辭釋》和《屈賦微》在解騷時多痛恨頃襄昏庸忘仇，曹耀湘《讀騷論世》、王樹枏《離騷注》、顏錫名《屈騷求志》中類似的論述亦是比比皆是：

> 繫心懷王不忘欲反者，懷王被留於秦，欲謀所以返國也。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者，望懷王之生還又望頃襄之復仇雪恥也。頃襄、子蘭蒙恥媮安，初無望懷王返國之意。……冀君之一悟者，欲頃襄之悟也。俗之一改者，欲朝臣之改行也。[81]（《讀騷論世》）
>
> 哲王謂太子頃襄王也。子蘭既置懷王於難，而頃襄王又信任子蘭，忘父之仇，賊賢挫國。[82]（《離騷注》註「哲王又不悟」。）
>
> 夫屈子以無罪見放，思君憂國，觸處生哀，其冀君一悟之心，蓋未嘗須臾忘也。乃涉江南來，正值頃襄夜獵。先君之讎不問，國蹙之勢不圖。惟與便辟佞倖，馳騁為樂，國事可知。[83]（《屈騷求志》註〈招魂〉「亂曰：獻歲發春兮……魂兮歸來，哀江南」。）

近代學者對頃襄王忘記父仇國恥的行為深感憤慨，因而在註騷的過程中常常流露出對頃襄王的不滿。更有甚者，認為屈原有廢頃襄王而另立明君的企圖。王闓運在釋〈離騷〉中即認為屈原有廢立之謀，其先否定頃襄的正統地位，其云：「無父之君不可與立也。」繼而認為屈原「欲更求楚宗室賢者立之」。[84]其立論可謂石破天驚，痛恨頃襄王的情緒可謂達到了高峰。

此外，對楚辭的新解奇論，還有廖平的楚辭非屈原所作之說。廖平認為楚辭是秦博士所作，其在《楚詞講義》中云：「〈秦本記〉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即《楚詞》也……著錄多人，故詞重意複，工拙不一，知非屈子一人所作。當日始皇有博士七十人，命題之後，各有呈撰，年湮歲遠，遺佚

79 同上註，頁 682。

80 同上註。

81 清・曹耀湘，《讀騷論世》，卷 1，頁 12。

82 清・王樹枏，《離騷注》，黃靈庚主編，《楚辭文獻叢刊》第 67 冊，頁 104。

83 清・顏錫名，《屈騷求志》，黃靈庚主編，《楚辭文獻叢刊》第 66 冊，頁 279。

84 清・王闓運，《楚辭釋》，《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02 冊，卷 1，頁 6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姓氏。」[85]其論亦是石破天驚。

五、借鑑與會通：開拓批評理論

近代楚辭學學術轉型的過程中，真正意義上的新變在於借鑑西方理論開拓了楚辭研究的新方法，是近代楚辭學新於前代的最突出的特徵。鴉片戰爭時期，西方強國以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的同時，亦帶來了西方的制度與文化。西學以此為契機如潮水般湧入中國，與傳統文化發生碰撞。此期開明的學者諸如林則徐、魏源等開始倡導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師夷長技以制夷。中日甲午戰爭後，中國的戰敗使得更多士人反省戰敗教訓，逐漸由保守走向開明，積極學習西方，一時間「觀歐風而心醉，以儒冠為可溺」。康有為、梁啓超更是將公羊改制思想與西方君主立憲制度相結合，宣導改制，至此學習西方不僅僅在於學習先進技術而是學習先進的制度，而更加注重引進政治體制與社會科學的內容，如嚴復翻譯《天演論》介紹西方進化論哲學等。西學滲透至文化制度領域，亦對近代學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楚辭學亦不例外。近代楚辭學因西方文藝、哲學理論的湧入而獲得了變革的力量。此時匯通中西的學者，如王國維、劉師培、魯迅等人，嘗試以新的理論審視楚辭，如以文化地理學肯定楚辭南方文學的特質，將楚辭置於浪漫主義詩學視野下闡釋其寫作特點等，均解構了以儒家詩教衡量楚辭審美特質的傳統，加速了傳統楚辭學的現代化轉變。

在此學術背景下近代楚辭學走向新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楚辭學內部的方法、理論創新，如王國維創造性將出土文獻與傳統文獻相結合考釋楚辭，開闢了以出土文獻研究楚辭的方法。劉師培等人以文化地理學的理論肯定楚辭的審美特質等。另一方面，則是借鏡西方理論重新審視楚辭，如魯迅以西方浪漫主義詩學審視楚辭的審美特質，王國維以「歐穆亞」審視屈原主體精神及楚辭創作等，均顛覆了傳統楚辭評論的理論基礎。楚辭研究得以在方法上、理論上均面貌一新。

（一）關注與應用新出文獻

近代楚辭學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首先表現在利用新的文獻方面，以王國維的楚辭研究為代表。其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中創造性地將紙上文獻與地下文獻相結合，利用出土的甲骨卜辭與文獻記載，解決了〈天問〉中一

85 廖平，《楚詞講義》，吳平、回達強主編，《楚辭文獻集成》（揚州：廣陵出版社，2008），頁 125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直困擾學界的「該秉季德」至「而後嗣逢長」十二句的指歸問題。

王國維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中認為此十二句「述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事。」[86]其在研究殷卜辭中發現卜辭中多有祭王亥之事，《殷虛書契前編》收錄兩條：「貞：賣于王亥。」，「貞之于王亥，卅牛，辛亥用。」[87]《後編》八條：

> 貞于王亥，求年。
> 乙巳卜□貞之于王亥十（下闕）。
> 貞賣于王亥。
> 賣于王亥。
> 癸卯□貞□□高祖王亥□□□。
> 甲辰卜□貞：來辛亥賣于王亥，卅牛，十二月。
> 貞：登王亥羊。
> 貞之于王亥□三百牛。[88]

在《龜甲獸骨文字》中有一條：「貞：賣于王亥，五牛。」[89]王氏通過對卜辭的分析，認為王亥當為商先祖，認為卜辭上所祭之「王亥」祭禮隆重，在商族享有至高地位，應為商之先公。繼而王氏通過《山海經》與《竹書紀年》的記載，推斷王亥乃是商先祖冥之子，上甲微之父。

> 〈大荒東經〉曰：「有困民國，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托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郭璞注引《竹書》曰：「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殺其君緜臣也。」今本《竹書紀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緜臣。」[90]

86 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觀堂集林》，卷 9，《王國維遺書》第 2 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板心頁 7 左。
87 同上註，板心頁 4 右。
88 同上註。
89 同上註。
90 同上註，板心頁 4 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王氏根據《山海經》及《竹書紀年》對王亥與有易的記載，認為《山海經》中的「王亥」，古本《竹書紀年》中的「殷王子亥」，今本《竹書紀年》中的「殷侯子亥」當為一人。並且《竹書紀年》有殷上甲微為王亥復仇之事，所殺之人正是殺死王亥的艾臣，遂認定王亥比上甲微早一世，當為上甲微之父。加之「《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表〉商先祖中無王亥，惟云：『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索隱》：『振，《系本》作核。』」[91]的記載。王國維遂認為《史記》中的「振」因與「核」、「垓」形近，應是「核」或者「垓」字之偽。根據這些文獻的記載，推測出冥、王亥、上甲微之間的關係。但是與王亥息息相關的「有易」，在〈天問〉中則未曾提及，王氏遂考證〈天問〉中的「有扈」當為「有易」，而非王逸所說的被少康所滅的澆國。王國維認為「有扈」與「有易」同是夏代部落，但是因為有扈多見於世遂改易為扈。又〈天問〉中有「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一句，王氏認為「有狄」亦「有易」之誤：

> 古狄易二字同音，故互相通假。《說文解字》辵部，逖之古文作逿。《書・牧誓》：「逖矣西土之人。」《爾雅》郭注引作「逿矣西土之人」。《書・多士》：「離逖爾土」。《詩・大雅》：「用逿蠻方」。《魯頌》：「狄彼東南。」《畢狄鐘》：「畢狄不龔。」此逖、逿、狄三字異文同義，《史記・殷本紀》之簡狄，《索隱》曰：「舊本作易。」《漢書・古今人表》作簡逿。《白虎通・禮樂篇》：「狄者，易也。」是古狄、易二字通。有狄即有易。[92]

王國維通過對《說文》、《尚書》、《詩經》等典籍的徵引，證明逖、逿、狄三字異文同義，「有狄」即為「有易」。不僅如此，王國維根據孫之騄的說法，認為有易之國「當在大河之北，或在易水左右」，[93]又根據《竹書紀年》的記載認為王亥有遷殷之事，「今本《竹書紀年》：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其時商侯即王亥也。」[94]王亥遷殷，由商丘跨越到大河之北，遂與有易產生了聯繫。王國維遂推斷〈天問〉中「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至「擊床先出，其命何從？」六句為王亥之事：「（王亥）故遊牧於有易高爽之地，服牛之利，即

91 同上註，板心頁 4 右。
92 同上註，板心頁 6 左。
93 同上註，板心頁 7 右。
94 同上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發見於此。有易之人乃殺王亥，取服牛。所謂『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者也。其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床先出，其命何從？』者似記王亥被殺之事。」[95]王國維此說與《山海經》、《竹書紀年》上關於王亥的記載正合。不僅如此，王國維亦以此為論證思路，結合卜辭與文獻記載證明「恆秉季德，焉得夫僕牛」為王恆之事，「昏微遵跡，有狄不寧」為上甲微之事。其論證詳實有據，解開了困擾了數代學者的謎團。

除王國維以外，近代學者劉師培亦時常關注新出文獻，將之運用到古典學術的研究當中。劉師培著《楚辭考異》，其目的雖是臚列、整理楚辭異文，但是在搜集文獻時亦務求纖細靡遺，並運用出土文獻與海外發現的文獻進行異文的搜羅。《楚辭考異》羅列了唐寫本類書及李若立《籯金》中的楚辭異文，二者均為敦煌新出唐寫本。劉氏於1910年研究敦煌新出文獻，在〈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中提到：「法人伯希和於敦煌所得唐寫本，其數至多，近閱其印片若干種。」[96]可見，《楚辭考異》中亦是劉師培運用新出的敦煌文獻校勘楚辭，對楚辭異文的搜羅力求詳賅。另外，劉氏《楚辭考異》亦搜集了大量原本《玉篇》殘卷中的楚辭異文。原本《玉篇》殘卷原藏於日本，光緒初年黎庶昌、楊守敬出使日本在東京時發現，並核定為「顧氏原本」。由於原本《玉篇》散於日本各寺院和各人手中，並非一時一地所得，黎氏遂將其陸續刊刻成書，題為《影舊鈔卷子原本玉篇零卷》收入《古逸叢書》。後又有民國初年羅振玉整理的原本《玉篇》，但是，劉氏《楚辭考異》著於1911年，其所使用的原本《玉篇》當為「黎本」。其在校勘楚辭時選取原本《玉篇》，而並非經孫強、陳彭年等增訂重修的《大廣益會玉篇》，目的是以南朝顧氏原本為依據，對南朝楚辭異文進行梳理，從中窺見楚辭版本的流傳。例如「椒又欲充夫佩幃」一句案語：「《文選・祭屈原文》注引『幃』作『緯』，原本《玉篇》糸部緯字注云：『《楚辭》或以此為帷字』，則古有作『緯』之本」。[97]可見劉師培在整理異文時亦注意使用出土文獻與海外新發現的文獻。

利用出土文獻與海外文獻研究楚辭，是楚辭研究的創新與突破。尤其是在成功利用出土文獻與歷史文獻考證〈天問〉後，王國維將這種研究方法歸結為「二重證據法」，實為後世楚辭研究者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指導。如唐蘭在為王國維《古史新證》作序時亦根據甲骨卜辭考證「昏微遵跡」中的「昏」應是

95 同上註。

96 劉師培，〈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劉師培全集》第 4 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頁 101。

97 劉師培，《楚辭考異》（臺北：廣文書局，1970），頁 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商先祖之名。他認為「夫以上甲之能帥契，焉能被以昏稱？昏蓋微之別名也。」[98]亦是使用殷卜辭對楚辭進行考證。吳其昌作〈卜辭所見殷先公先王三續考〉，亦對王國維考辯〈天問〉王亥、王恒的史跡進行了補正，也是結合殷卜辭對「有扈」當為「有易」之說進行補充。

（二）激發理論潛力

近代楚辭學較前代楚辭學另一大創新之處，即是以新的理論視角審視楚辭，在楚辭學領域開一瑰境。一方面，劉師培、王國維以文化地理學的視角審視楚辭，使楚辭脫離經學語境而獲得了獨立的審美地位。另一方面，魯迅、王國維等以西方的理論觀照楚辭，激發了楚辭研究新的理論能量。近代學者將楚辭視為文章之祖、詩學典範，並對楚辭與儒家相悖的審美內涵進行肯定與欣賞，不僅提高了楚辭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亦促使楚辭批評的現代化轉型。

在將楚辭與經學的分離上，劉師培、王國維等人以文化地理學的視角，將楚辭中異乎經典、驚采絕豔的審美特質歸結為南方文化的影響。認為楚辭與《詩經》的迥異是南北文化差異的產物，並不能以此劃分二者孰優孰劣。如劉師培在〈南北文學不同論〉中云：

> 屈平之文，音涉哀思，矢耿介，慕靈修，芳草美人，託詞喻物，志潔行芳，符於二〈南〉之比興。而敘事紀游，遺塵超物，荒唐譎怪，復與莊、列相同。[99]

以劉師培的觀點論之，楚辭錯彩鏤金、金相玉質的藝術特質孕育在南方土壤之中，具有獨創性。不僅如此，劉師培在其《文說》中更單立〈宗騷篇〉將楚辭視為文章之祖。推重楚辭為「擷六藝之精英，括九流之奧旨。信夫駢體之先聲，文章之極則矣」。[100]其意圖是與《文心雕龍》中的〈宗經篇〉相對應，雖非將楚辭視為高於「六經」之作，但是將楚辭置於文章學的視角下，肯定其在審美價值與藝術表現上已超越「六經」，將楚辭推為文學至高典範，是對前代學者宗經傳統的一種解構。雖然如此，〈南北文學不同論〉並非楚辭研究的專論，劉師培論述的重點在於南北文學的不同，楚辭僅作為南方文學的典範進行闡述，

98 轉引自周文玖，〈關於王國維的《古史新證》和唐蘭先生的〈序〉〉，《史學史研究》第 3 期（2003），頁 28。

99 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劉師培全集》第 1 冊，頁 557。

100 劉師培，〈宗騷篇〉，《文說》，《劉師培全集》第 2 冊，頁 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涉及楚辭審美內涵、文學價值的評價著墨不多。劉師培之後，王國維〈屈子文學之精神〉也將楚辭置於南北文化的背景下進行審視，認為楚辭並非南方文化的產物，而是南北文化融合的結果，其即沾染了南方浪漫的詩學特質，又有北方關注現實社會的精神。認為「大詩歌之出，必須俟北方人之感情，與南方人之想像合而為一，即必通南北之驛騎而後可，斯即屈子其人也。」[101]認為屈原之詩歌是南北文化相結合的產物，遂將其視為詩歌之典範。其云：

> 彼之豐富之想像力，實與莊、列為近。〈天問〉、〈遠遊〉鑿空之談，求女謬悠之語，莊語之不足，而繼之以諧，於是思想之遊戲，更為自由矣。變《三百篇》之體，而為長句，變短什而為長篇，於是感情之發表，更為宛轉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學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開之，然所以驅使想像而成此大文學者，實由其北方之肫摯的性格。[102]

王國維認為楚辭驚采絕豔、瑰麗奇幻的藝術魅力來自於南人豐富的想像力，又因此而思想更豐富自由，較於北方文學在表現形式上亦變短篇為長篇，變四言為長句，使得表達感情方面更加婉轉曲折。其將屈原的創作視為得南北文學之長，在思想情感上近於北方，在藝術表現上取法於南方，從而使得楚辭既具有瑰麗奇幻的藝術特色又有忠君自修的深邃感情。

劉、王二人以文化地理學的視角審視楚辭并非新創，以文化地理學的角度評騷古已有之。早在王逸《楚辭章句》中就有「〈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103]之說。王逸已將〈九歌〉的創作與南方沅湘之地信鬼而好祠的風俗相聯繫。宋人黃伯思也曾從地理文化的角度論證楚辭的地域特徵，他在〈新校楚辭序〉中云：「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104]可見王逸與黃伯思主要從風俗與名物的角度闡釋楚辭地域特色，但並沒有觸及深層的文化內涵。劉、王二人的創新之處在於利用文

101 王國維，〈屈子文學之精神〉，《靜安文集續編》，《王國維遺書》第 5 冊，頁 33。

102 同上註，頁 34。

103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55。

104 宋・黃伯思，〈新校楚辭序〉，呂祖謙編，《宋文鑑》（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 92，頁 13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化地理學的視角打破了傳統楚辭評論中以經義為核心的評論觀，而不是以文化地理學的角度解釋楚辭不符合經義的審美特質。二人從文化地理學切入，楚辭中靈氛占吉、巫陽下招、駕飛龍等具有浪漫色彩的因子，不再是異乎經典的譎怪之談。屈子的怨君不悟、憤而投水亦不是不合經義的狷狂之行，而是南方地理環境、思想文化浸潤下的產物，具有獨創性。

此外，借鑑西方理論審視楚辭，是近代楚辭學最具創造性的變化，亦是楚辭學向現代轉型的突出標誌。王國維、魯迅的楚辭研究即是代表。王國維〈屈子文學之精神〉以「歐穆亞」（幽默）來詮釋屈原的文學精神，其云：

> 蓋屈子之於楚，親則肺腑，尊則大夫，又嘗管內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於國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於懷王又有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終不能易其志，於是其性格與境遇相待，而使之成一種之歐穆亞。〈離騷〉以下諸作，實此歐穆亞所發表者也。[105]

王國維分析屈原與楚國關係「親則肺腑，尊則大夫」是屈原早期被懷王重用之時，屈子思想受北人的影響，是積極的、入世的，渴望施行美政。「一疏再放」則是懷王聽信小人讒言，漸疏屈原和頃襄王將其放逐江南之時。美政的理想在現實面前無力施展。屈原不見信於懷王，國無賢人與之共同施行美政，屈原只能效仿前賢，最終絕望求死，現實的打擊「終不能易其志」。此種在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衝突下產生的既不妥協又不屈服的精神王國維稱之為「歐穆亞」，且屈原〈離騷〉以下諸篇均是這種「歐穆亞」人生觀的體現。王國維以「歐穆亞」闡釋屈原的人格精神，實際解決了屈原主體精神中「忠貞」與「怨懟」的矛盾，解決了歷代學者關於屈原「怨君」問題的論爭。王氏以此闡釋屈原文學精神實則借用了西方的哲學理論。如：叔本華認為「幽默」是一種心境與外在世界之間的「調節」，是理想與現實相衝突時既不願逃避又拒絕屈服的心態。海甫定闡釋幽默說：「此種滑稽之情之對同情之對象而發者，謂之曰：歐穆亞，及其發達，遂成一種之人生觀，即一面既知世界人生之局促苦痛，愚闇不平，一面仍不失對一切生物之愛情，及對管轄自然及歷史之勢力之信仰故也。」[106]觀此，則王國維「歐穆亞」的理論來源不待言自明。

105 王國維，〈屈子文學之精神〉，《靜安文集續編》，《王國維遺書》第 5 冊，頁 34。

106 海甫定（H. Hoffding）著，龍特氏（Loundes）譯，王國維重譯，《心理學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頁 4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品評楚辭審美特質方面，魯迅亦是以西方理論研究楚辭的先鋒，其〈摩羅詩力說〉直接將楚辭置於西方浪漫主義詩學中，視楚辭為中國浪漫主義詩歌的典範。他云：「蓋詩人者，攖人心者也。凡人之心，無不有詩。」[107]將詩歌看作是情感的載體，而非傳道的載體，當是自由獨立的。繼而推重楚辭的言前人所不敢言：「惟靈均將逝，腦海波起，通於汨羅，返顧高丘，哀其無女，則抽寫哀怨，郁為奇文。茫洋在前，顧忌皆去，懟世俗之渾濁，頌己身之修能，懷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瑣末，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108]對楚辭暴顯君過、放言無憚這些前代批評家所批判的因素進行了充分地肯定。魯迅對屈原個性情感張揚的肯定，亦是對前代批評家將楚辭置於儒家詩教的視野下審視的反駁，為後世以純文學的角度從事楚辭批評開一途轍。

要而論之，王國維、魯迅等人以西方理論觀照楚辭，而將其視為詩體典範，實際是脫離了經學的視野，楚辭不再是經學的附庸，其「異乎經典」、「變風變雅」之說更無從談起。王、劉、魯等人對楚辭獨創性的肯定亦可視為是近代楚辭評論的新變。「五四」以後，思想界迎來了徹底的解放，楚辭研究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新氣象。此時研究楚辭的名家大師諸如梁啓超、陸侃如、聞一多、郭沫若、蘇雪林等都貫通中西，將西方的理論融會在楚辭研究之中，打破了傳統的訓詁、考據、義理的壁壘。可以窺見，楚辭學走向現代化，其發端在於近代，劉師培、魯迅、王國維等人做出了可貴的嘗試，在近代楚辭學走向革新的環境下，後起學者耳濡目染將楚辭研究徹底推向現代化，可以說近代楚辭學者拉開了現代楚辭學的序幕，是現代楚辭學的先鋒。

六、結論

綜而論之，近代楚辭學受到特殊的歷史環境與學術思潮的影響，出現了脫離傳統楚辭學話語體系而向現代楚辭學轉化的傾向。尤其是西方文化的衝擊，使得楚辭研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論能量，劉師培、王國維、魯迅等人率先借鑑西方文藝理論審視楚辭，將楚辭評論從傳統詩教的桎梏中解脫出來，肯定楚辭獨立的審美特質，楚辭研究亦因此而面貌一新。但是由於傳統研究方法已根深蒂固，在其蛻變與轉化的過程中亦產生了變異。尤其是傳統的楚辭學者仍試圖以註經的方法箋註楚辭，但是近代內憂外患、江河日下的社會環境，使得學

107 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 1 卷，頁 70。

108 同上註，頁 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無法像乾嘉學者一樣埋頭經籍，而是將近代的時代環境比附屈原所處的楚國末世，因而與屈原建立了情感共鳴，其箋註楚辭時亦逐漸從「我注六經」轉向「六經注我」，推崇屈原潔身自修精神的同時，更是將屈原看作治世能臣繼而渴望註騷以經世。所以出現了將經世之思、興國之願注入到楚辭之中，將屈原視為謀臣賢士，視為英雄失路的知己。無論是欲為魯仲連、陳湯的王闓運，還是「家國存亡之故，未嘗一日釋諸懷」的馬其昶，抑或是常思「一官一邑，尚可為民造福」[109]的王樹枏……他們身處中華千年未有之亂世，在政治漩渦中掙扎、蛻變，對挽回國家頹勢抱有渴望。所以在註解楚辭時，對楚辭的感受有了不同前代的認識。這種新的認識，主要集中在對楚辭內容具體的闡釋上，近代楚辭學者借註騷以抒懷，在註解楚辭中注入了自己對世態的看法。不僅如此，近代楚辭學者在闡釋屈原形象時產生了變異，而將屈原塑造成謀士能臣，甚至權臣。雖然這些學者有些並未涉足政壇，也未曾有機會起衰救弊，但是從他們對楚辭的理解上可以看到他們對治世救國的渴望。客觀地說，近代楚辭學者對楚辭的理解常流於附會，甚至出現許多不能為人所接受的奇詭之論，但是透過這些附會之論、奇詭之說，可以看出近代楚辭學者渴望註騷淑世，借楚辭來抒發興國存君的理想，帶有著強烈的時代精神。近代楚辭學處於傳統楚辭學與現代楚辭學的過渡階段，其一方面獲得了新的理論來源，孕育出變革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受到傳統學術研究的影響，未能徹底地破舊立新，加之特殊的社會環境與學術環境，使其在學術轉型的過程中亦產生了種種異變。然而正是因為新變與異變的雙重色彩，造就了近代楚辭學在楚辭學史上新舊交融的獨特面貌。

109 卞孝萱、唐文權編，《辛亥人物碑傳集》（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頁 7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宋・朱熹，《楚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宋・呂祖謙編，《宋文鑑》，北京：中華書局，1992。

清・王闓運，《楚辭釋》，《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0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景印清光緒二十七年刻本。

清・馬其昶，《屈賦微》，《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0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景印光緒三十二年集虛草堂刻本。

清・曹耀湘，《讀騷論世》，南京：南京圖書館藏，民國四年湖南官書報局鉛印本。

清・方東樹，《漢學商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清・戴震，《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4。

清・顏錫名，《屈騷求志》，黃靈庚主編，《楚辭文獻叢刊》第65-66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景印清光緒年間稿本。

清・王樹枏，《離騷注》，黃靈庚主編，《楚辭文獻叢刊》第 67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景印清光緒末至民國初新城王氏刻《陶廬叢刻》本。

二、近人論著

王代功，《清王湘綺先生闓運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王國維，《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

卞孝萱、唐文權編，《民國人物碑傳集》，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

———，《辛亥人物碑傳集》，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

任訪秋，《中國近代文學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

李中華、朱炳祥，《楚辭學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6。

周文玖，〈關於王國維的《古史新證》和唐蘭先生的〈序〉〉，《史學史研究》第3期，2003，頁26-52。

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北京：中華書局，19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海甫定（H. Hoffding）著，龍特氏（Loundes）譯，王國維重譯，《心理學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

陳子展，《楚辭直解》，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

———，《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黃霖，《近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廖平，《楚詞講義》，吳平、回達強主編，《楚辭文獻集成》，揚州：廣陵出版社，2008。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劉師培，《劉師培全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

———，《楚辭考異》，臺北：廣文書局，1970。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novation and Variation: Modern Changes of *Chuci* Studies During 1840-1919 in China

Li, Wen *

Abstract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fficulties in modern environment and the academic trend of 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eastward had pushed *Chuci* Studies to the critical point of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On the one hand, *Chuci* scholars who were versed i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learning, such as Wang Guowei and Lu Xun, drew energy from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to examine *Chuci*, freeing *Chuci* criticism from the shackles of poetic education and made it new. On the other hand, traditional *Chuci* scholars who were dually influenced by social environment and academic trend, including Wang Kaiyun and Ma Qizhang, devoted themselves to carrying forward the sublime words with deep meanings in *Chuci* when noting it, thus giving birth to unusual commentarie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Qu Yuan's image and the treatment of "monarch resenting" and "talents seeking" in *Chuci*. Therefore, modern *Chuci* studies had been presenting the dual colors of innovation and variation.

Keywords: *Chuci* Studies, Modern changes, *Chuci Shi*, *Qufu Wei*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Soochow University.
Email: venvn0403@163.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